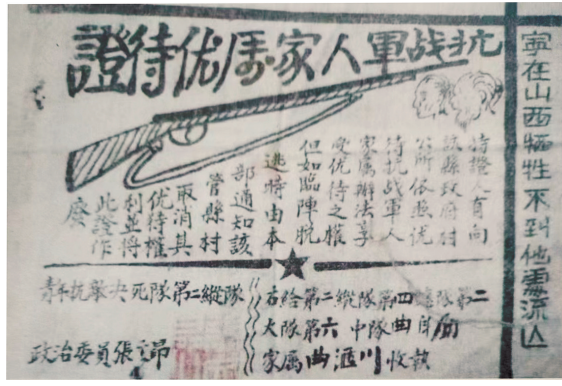


红色收藏



抗战军人家属优待证(作者供图)

这是一张青年抗战决死队第二纵队发给抗战军人家属的优待证,上面文字为: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处流亡

抗战军人家属优待证

持证人向该县政府村公所依照优待抗战军人家属办法享受优待之权,但如临阵脱逃时由本部通知该管县村取消其优待权利并将此证作废

右给第二纵队第四总队第二大队第六中队副队长家属曲汇川收执

青年抗战决死队第二纵队政委张文昂(章)

优待证标题下画有一支七九式步枪,是当时抗日战士常用的步枪,渲染了全民抗战的气氛,鼓舞抗战将士奋勇杀敌。山西抗战民歌:“手拿起七九枪高粱地里爬,不赶走日本鬼子誓不回家。”与优待证上的宣传口号“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处流亡”内容是一致的。

优待证右上方画有一男一女两个老人头像,表示对抗战将士父母送子当兵义举的感谢与尊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以红五星作为自己的标志,优待证中下方红五星表示决死队虽然是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但领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

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又称新军,1937年8月1日,在山西国民师范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宣布8月1日为新军诞生日。决死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当局合作在山西成立的一支新军。不久,这支队伍扩建为决死队第一纵队,辖第一、第二两个大队,纵队长鲁应麟,政治委员薄一波。从8月到10月,又建立了决死第二纵队,纵队长崔郁,政治委员张文昂;决死第三纵队,纵队长陈光斗,政治委员戎子和;决死第四纵队,纵队长梁浩,政治委员雷任民。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时,决死第二纵队政委由韩钧接任。1940年1月2日,韩钧率领决死第二纵队与八路军115师晋西支队一起由交城进入娄烦地区的天池川,驱逐阎军暂编第二旅,并抓获处决了旧政权静乐县县长袁希儒,在来峪镇短暂休整后转战临县。

1940年1月10日,第二纵队和358旅、晋西支队在滕代远的指挥下,向盘踞在临县的顽敌赵承授、郭宗汾部发起进攻。战斗中,决死二纵队独立2旅6团连夺13个山头,歼敌骑1军少将副团长和33军后勤机关100余人,缴获山西银行的全套印钞设备。这次战役还生擒敌副师长郭如嵩及所部2000余人。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以彻底失败告终。1月15日,各路反顽大军在临县胜利会师,召开庆祝大会,临县抗日民主政权宣告成立。大会授予6团“老6团”光荣称号,授予5连“纵队模范连”称号,授予5连连长文尚智同志“战斗英雄”称号。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致电称誉:“决死二纵队是党领导的有保证的部队。”

粉碎“十二月事变”以后,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的4支纵队全部编入八路军序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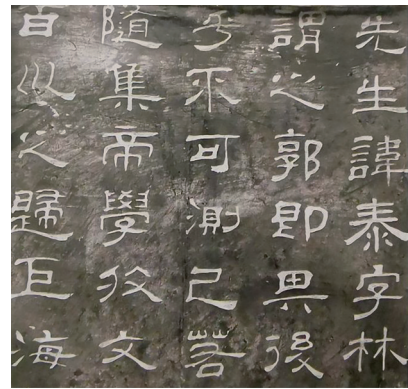
前方将士杀敌 后方优待家属

张贵桃

强建生

傅山重刻郭泰碑

介子平



傅山书郭泰碑拓片局部(作者供图)

傅山一生交游甚广,身行万里半天下,于山西各处留有足迹,存有手迹。与介休干系,可自一通碑碣说起。

东汉一代名士郭泰,字林宗,又名有道,介休人。时为太学生领袖人物,党锢之祸后,被誉为党人“八顾”之一。东汉建宁二年(169)正月,郭泰去世,年四十二。当时“自弘农函谷关以西,河内汤阴以北,二千里负笈荷担弥路,柴车苇装塞途”,万人会葬,场面恢廓。蔡邕亲为其撰碑,文而不华,质而不野,不激不厉,刚柔相济,到底是大家大手笔。其对后世影响之大,可自所涉此碑的一百三十余种著述而知,然此碑久已湮灭。清康熙年间,邑人方刻傅山所书《郭有道碑》立于介休城东五里郊野处的郭有道祠,算是补憾。上世纪该碑又移至县博物馆,虽残犹存,立于后土庙真武大殿廊下。

傅山此碑未标镌刻年月。清康熙版《介休县志》载有“康熙十二年傅山复补书”一句,而邑人张基倡修林宗祠,在清康熙十八年(1679),书碑与刊刻或非一时。据郝继文先生考据: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末,傅山在平定“峪园”养病,介休士绅来访,谈及补写“郭泰碑”事。翌年四月,祠堂修葺前期准备就绪,傅山偕石匠王良翼、茹谦,携子傅眉、孙傅莲、孙傅苏一同前来。具体由傅莲苏与茹谦双钩上石,王良翼刀刻制。碑侧有傅山草书长跋,叙重书此碑始末、原刻考证及学隶心得,跋记有云:“吾家世习汉隶,间尝与息眉、孙莲苏各以其手法书一本,藏于家。会介人士磨石要书,老人不复能俯石上受苦,爰以家本令莲苏双钩过之石上。”此间傅山于介休的其他活动,未闻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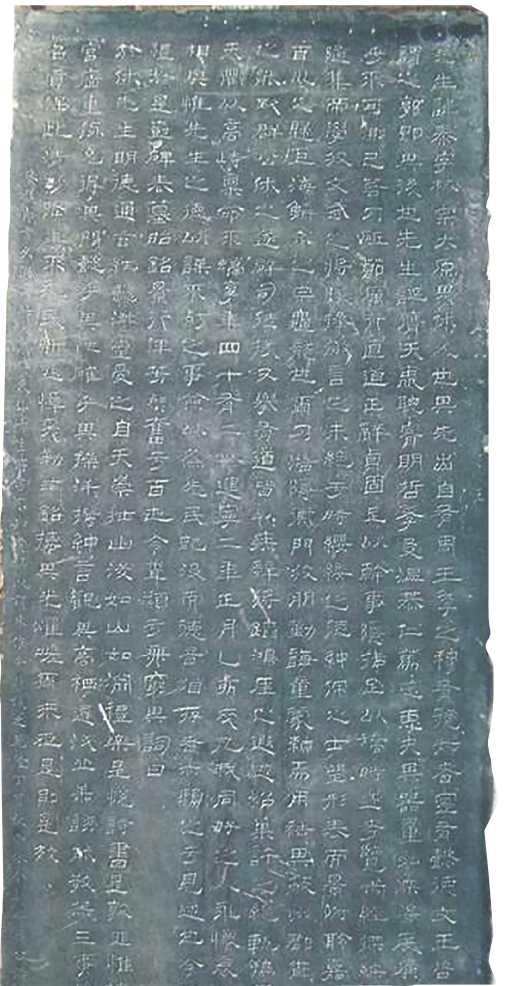
介休博物馆藏有此碑早期拓片,碑额“有道先生之碑”六字为悬针小篆,因碑首已佚,此拓孤本,是否傅山亲书,未知。《郭有道碑》正面为傅山书蔡邕原文,计十二行,行四十字,依汉制,不具名。或因傅山与之品行相类,可谓璧合,或因蔡邕碑原为隶书,率由旧章。

此通碑刻为傅山存世的唯一隶书原刻碑,其在书法史上当有一笔。

傅山所遗隶书虽不多,却重视习隶:“不作篆隶,虽学书三万六千日,终不到是处,味所从来也。予以隶须宗汉,篆须熟味周秦以上鸟兽草木之形,始臻上乘。”“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矣。此意老篆即得,看《急就》大了然。所谓篆隶不足观矣,不但形相,全在运笔转折活泼处论之。”“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钟、王之不可测处,全得自阿堵。老夫实实看破地,功夫不能纯至耳,故不能得心应手。若其偶合,亦有不减古人之分厘处。及其篆、隶得意,真足吁嗟,觉古籀、真、行、草、隶,本无差别。”

其著名的“四宁四毋”理论,同样惯用于隶书实践:“汉隶之妙,拙朴精神。如见一丑人,初见时村野可笑,再视则古怪不俗,细细丁补,风流转折,不衫不履,似更妩媚。始觉后世楷法标志,摆列而已。故楷书妙者,亦须悟得隶法,方免俗气。”“汉隶古雅雄逸,有自然韵味。魏科变以方整,乏其蕴藉。唐人规模之,而结体运笔失之稍滞,去汉人不衫不履之效已远。降至宋元,古法益亡。”

残剩河山,满目荒凉凉可语;乱离骨肉,西风吹老丹枫树。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一辈子平视王侯、宁折不屈的傅山,轰然倒下。入世之隐,遗世之响,此碑手迹成为其在此地足迹之重要见证。死而不亡者寿。傅山寿,郭碑也寿。



位于介休后土庙的傅山书郭泰碑局部(作者供图)

考古的力量

黄晓峰



海昏侯墓复原图(资料图片)

考古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用心地探究地下的历史遗存,让埋藏许久的古代遗存重现天日,更在于通过这些遗存拨开时空的迷雾和积尘,填补历史的空白,昭示和还原历史的真实。

这是我在江西省南昌市海昏侯西汉大墓考古发掘现场及随后在江西博物馆看到“惊世大发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时深刻的心理感受。

海昏侯西汉大墓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惊喜,被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海昏侯刘贺主墓出土的前所未有的巨量黄金(金器总数约480件,总重115公斤,包括金饼385枚、马蹄金48枚、麟趾金25枚、金板20块),佐证了西汉黄金储量惊人的文献记载;出土的总重10余吨达200余万枚的五铢钱,展示了西汉空前强盛的国力;出土的编钟、编磬及金车、鼓车则见证了“礼乐”的复兴;出土的“孔子屏风”和总数近万枚的竹简、木牍,更是说明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尊孔崇儒已经成为了西汉时期的时代风尚;还有大量的青铜器、玉器、漆器及车马坑等,2万余件文物涉及西汉的政治、经济、美术、文学、乐舞、工艺诸多领域,将史书中西汉王朝的繁盛与奢华绘声绘色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但更让我震惊的,是海昏侯西汉大墓考古发现对墓主人刘贺形象的真实还原。

海昏侯西汉大墓的主人刘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从封王到皇帝又沦为侯爵的悲剧人物,他的人生跌宕起伏,极具传奇色彩。

刘贺的爷爷是汉武帝刘彻,他的奶奶是著名的《佳人歌》中的主角李夫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许是李夫人的缘故,其父刘髡

很受汉武帝喜欢,将他封为昌邑王,却不幸早逝,刘贺年仅5岁便成为第二代昌邑王。

刘贺的人生巅峰位于西汉元平元年即公元前74年,这一年汉昭帝刘弗陵因病去世,昭帝无子,权臣霍光在皇族中遴选出年纪尚轻又无执政经验的刘贺继位大统,成为西汉第九任皇帝。但刘贺登基仅仅27天便遭废黜,史称汉废帝。

刘贺落魄地返回故土,在严密的监视中,大门常年紧闭,只开小门,战战兢兢地虚度着自己的余生。西汉元康三年春(前63),汉宣帝一纸诏书又将刘贺封到千里之外的海昏县为侯,海昏县的“海”指鄱阳湖,“昏”是太阳下山的位置,也就是西边,海昏便是鄱阳湖以西的意思。西汉神爵三年(前59),34岁的刘贺在愤懑中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

史书中的刘贺长相猥琐:面部青黑,小眼睛,鼻子尖而低,须毛稀疏,痴癫昏聩。这样的记载令人生疑,以汉武帝的英武和李夫人的倾国倾城,其嫡孙刘贺长相怎会如此不堪!当然,这仅仅是猜测,但海昏侯墓海量的考古发现,真的让我们可以在史书之外,从文物的角度,发现和还原另一个与史书记载迥然不同的刘贺,它可能比《汉书》《资治通鉴》客观和真实得多。

海昏侯西汉大墓结构采用的是汉代居室化布局,主椁室分为东、西两室,东室是海昏侯的卧室,西室是海昏侯的书房。一个不学无术的废帝,在墓葬中怎么会设有书房?出土的“孔子屏风”和《论语》《礼记》《易经》等典籍的书简,表明其似乎并非不学无术之徒。博山炉、连枝灯、围棋盘、砚台等雅玩,看得出刘贺具有一定的品位格调;成套的编钟、编磬,偶乐车上的钟子、铙、建鼓,加上笙、箫、瑟等乐器,则可见刘贺好雅乐。

其实,即使史书中的刘贺事荒唐、劣迹斑斑,但我们依然可以捕捉到他善良真诚的影子。刘贺被废后,从昌邑国追随他的近臣200余人被杀。临刑时,这些人“号呼市中”,高呼“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由此可见,刘贺被废,最大的可能是不甘沦为霍光的傀儡。

所以,考古发现和研究的真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刘贺的历史真相。

海昏侯西汉大墓考古研究还在继续,蒙在刘贺身上的历史尘埃正在一点点地被清除,历史终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随着海昏侯西汉大墓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考古一定会显示出它巨大的能量,还原出刘贺真实的人生。

冰箱为何为“箱”

杨雪

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柜要有门,箱要有盖,横拉门为柜,上开盖为箱。那么,我们现在使用的电冰箱是横拉门,它为什么叫电冰“箱”呢?原来,我国历史上就有冰箱,它出现时是箱形,上开盖,因此叫冰箱。20世纪30年代电冰箱传入中国时,就顺着它的古代称谓,加了一个“电”字,便有了汉语中的“电冰箱”一词,发展至今,便简称家用电冰箱为冰箱。

现代人几乎家家户都有冰箱,而清代,即使在宫廷中,冰箱亦是较为奢华的用品,那时的冰箱并不用电,而是使用冬季储存在冰窖中的天然冰块。太原市博物馆“出土成金——馆藏明清瓷器展”展厅便陈列着这样一件清光绪青花缠枝莲纹冰箱。

这件清光绪青花缠枝莲纹冰箱整体呈方形,棱角,四壁自口新收至底,器壁较深,承接浅圈足。通体青花瓷

饰,口沿绘回纹一周,正面回纹之中留白横书“大清光绪年制”楷书款,具有清代光绪官窑款识的典型特征。回纹之下饰倒垂如意云头纹一周,腹部四面满绘缠枝莲纹,中心绘团螭,内部各书一字,组成篆书“万寿无疆”字样。腹部绘缠枝莲纹,于莲瓣之内填绘折枝花卉。上附平顶盖,与口相合,面由两面合拼而成,周饰回纹,面饰缠枝莲纹,盖面均匀分布着四个铜钱式镂空,为出气孔,上饰冰梅纹。整体器物青花发色沉稳,笔触细腻,品相佳美。

清代的冰箱,由古时的“冰鉴”(古代盛冰的容器)发展而来,除瓷制外,还有掐丝珐琅、木制等不同材质。瓷冰箱由于体量硕大、胎体厚重,且需要接胎而成,烧制难度很大。酷暑时从冰窖取出冰块置于其中,用于保存、冰镇瓜果饮品,通过盖面的钱形孔,又可散发冷气,起到调节室内温度的作用,既节能又环保,可谓一物两用。



清光绪青花缠枝莲纹冰箱(太原市博物馆藏)

秦晋两觥 各美其美

慧亭

在山西博物院和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着两件极为有趣的青铜器——兽形觥和日己觥,这两“家伙”浓眉大眼,张口露齿,蜗牛似的触角下还藏着一对立着的耳朵,配上蹲坐的姿势,简直就是萌系野兽中的一对“双胞胎”。

兽形觥,收藏于山西博物院。是一件商代晚期的酒器。1976年出土于灵石县旌介村,通高21.5厘米,长24厘米。日己觥,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较山西博物院的兽形觥整体要大一些,通高32厘米,长33.5厘米。

觥是一种酒器,又名“兕觥”。觥非“自名”,称“觥”是宋朝时对该类器型的命名。觥的器身很像一只匏,多为椭圆形或长方形,一侧是宽阔的槽流,前段高于器口,另一侧有鬲。器盖则随着器口的形状走势制作成弯曲状,与器口完全贴合,罩住器口。

青铜觥最早可追溯到商代中期的殷墟妇好墓,然而自西周中期起,其身影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这一变化背后的原因,源于周朝统治者对商代因酗酒导致国家覆灭的深刻反思。为此,周朝严格限制了饮酒行为,进而导致作为酒器的青铜觥逐渐式微。

兽形觥与日己觥乍一看十分相似,尤其是都有蘑菇状的兽角和觥牙咧嘴的表情,但在仔细观察下则各有特色。从器型上看,两件觥均为圈足,但兽形觥器身为椭圆形,日己觥的器身则是长方形。从器身纹饰上看,两件觥均为器身满饰花纹,兽形觥纹饰复杂精美,呈现出商代较为典型的“三层花”雕刻装饰工艺、神秘狞厉的时代风格;而日己觥纹饰虽也是三层,但圈足和盖的边缘都饰一周小鸟纹,说明它产生在西周早期的昭穆时代。

商代装饰纹饰具有极强的神秘感,为各种动物的变体或合体,这与商代祭祀文化以及当时对大自然的认知密切相关。西周时期所表现的神话力量递减,动物纹饰趋向写实,鸟纹、龙纹显著增加,从商代的“饕餮时代”进入“凤鸟时代”。

观其尾部,两件觥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兽形觥的觥盖是较为多见的半圆把手形兽首鬃,而日己觥的觥盖则为一披垂下来的尾屏所替代,其上刻有并排的锁链状纹,如孔雀尾羽上的宝珠形羽毛,象征着凤尾。另外,兽形觥上并无铭刻,仅以其器型为其命名,而日己觥器盖同铭各18字,大意是作器者为其去世的父亲日己铸造了这件祭器,希望可以庇护子孙万代。



日己觥(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兽形觥(山西博物院藏)